

doi:12.3969/j.issn.1672-0598.2011.03.026

戈迪默笔下的孤独

——《无人伴随我》的孤独主题*

梁本彬

(重庆教育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系,重庆 400067)

摘要:本文以斯塔克夫妇的情感历程为例,分析《无人伴随我》中普遍存在的孤独及其成因。政治主导了南非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与人的关系被异化为简单的利益权利关系,沟通与交流变得遥不可及,个体陷入了无底的孤立隔绝深渊之中。爱没能让他们摆脱出来,反而使他们更加孤独。政治生活的喧嚣之下,正是个体灵魂深处那无法排遣的孤独寂寞。

关键词:《无人伴随我》;爱;孤独;政治

中图分类号:I408.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1)03-0150-04

戈迪默一直致力于探索南非种族政治对身处其中的家庭和个人造成的深远影响。她从独特的视角,揭示出南非独特的社会现实以及家庭和个人的存在状态。瑞典学院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说:“(纳丁·戈迪默)通过给读者传达一种强有力的真实感、以及带着广泛的人类的相关性,她把那种种族隔离世界中极其复杂的和完全没有人性的生活状况展示在世人面前”^{[1]85}。这段颁奖词客观公正地评价了戈迪默的社会责任感和创作倾向。在第一部长篇小说《说谎的日子》(The Lying Days, 1953)里,戈迪默就开始描写被种族政治所扭曲的人际关系。在后来的作品中,种族政治与个人生活的关系亦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得到了表现。而在《无人伴随我》中,戈迪默将这一关系的探讨更向前推进了一步,通过展现人物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入木三分地再现了后

种族隔离时代的政治和社会给家庭和个体心灵造成的深远影响。

《无人伴随我》是戈迪默的第11部小说,发表于1994年,是戈迪默的第一部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小说。无论从小说形成的时间还是内容来看,这部小说都可以看着是一部描写南非过渡时期的小说,该小说因而被看成一部“过渡时期的小说”(a novel of transition)^{[2]46}。在这特殊的社会背景下,政治演变成小说中诸人物生活的轴心,主导了他们的生活,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由于政治的高度离心作用,小说诸人物的生活变得呆板而单调,孤独寂寞像梦魇一样充斥于他们的内心之间。爱成了他们摆脱孤独寂寞的救命稻草。然而在政治主导一切的社会环境里,爱并未让他们从孤独中解脱出来。正如小说中所说的那样,“也许那个旧政权的灭亡使得放弃一种旧的个人生活

* [收稿日期]2011-03-21

[基金项目]重庆教育学院院级科研项目“南非作家戈迪默小说中的孤独主题研究”

[作者简介]梁本彬(1982—),重庆人;英语语言文学硕士,讲师,在重庆教育学院任教,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和英语教学研究。

注:文中小说的引文均出自《无人伴随我》,不再一一标注,仅标出页码。

也成为了可能”^{[3]281},在这样一个新旧政权更替的真空状态里,身处其间的个体也如同生活在真空中,传统的生活方式已不复存在,而新的生活方式尚未出现,没有寄托,没有归宿,只有挥之不去的孤独寂寞。戈迪默以其著称于世的细腻文笔和独特的心理描写技巧,将爱与孤独巧妙地置于南非独特的政治社会背景下,深刻而又细腻地再现了南非后种族隔离时代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爱让他们变得更加孤独。斯塔克夫妇(贝内特、维拉)的情感历程正是对此绝好的诠释。

一、自我与存在之爱

爱是斯塔克夫妇生命中至关重要的部分,严重影响着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对待爱截然不同的态度,构成了小说张力的主要来源,推动着小说情节不断向前发展。

女主人公维拉是一位威望很高的资深白人律师,但在男女问题方面,却让人不敢苟同。维拉将男女之爱视为证明其存在的方式,试图通过与不同的男人做爱来解除孤独,分担负担,证明自己的存在。对维拉而言,性爱是她和男人联系的唯一纽带,她和男人保持的联系都是因为他们的“那种能力”¹⁴¹。在维拉看来,“爱情并不附有那样的契约”¹⁷⁵。维拉与丈夫、情人的联系仅仅是性爱,不是夫妻以忠贞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性契约和责任。弗洛伊德将性爱看做生命的原动力,这一理念正好在维拉身上应验。性成了维拉感知世界的触角,与男人世界联系的纽带。性爱支配着维拉的生活,催始维拉去回忆,去思考,然后对性充满期待和幻想。

而维拉的丈夫贝内特对待爱情的态度却截然相反。他曾是一名大学教师,热衷于艺术,但是为了维拉他放弃了当艺术家的念头,开始从事箱包推销,以此为维拉提供经济保障,爱维拉成了“他的职业”²⁶⁰。贝内特常常为维拉取得成就而感到由衷的自豪,将维拉美化到理想状态,拒绝接受现实中不完美的维拉,“曾如此坦率地选择了他的维拉,她怎么可能是狡诈的?这对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²²¹。他早就知道维拉一直与别的男人有染,却对维拉依旧不离不弃,没有维拉,他无法生活。经商破产以后,他此时才真正意识到维拉对他没有感情,终于在孤独中离开了维拉,到伦

敦去找他们的儿子伊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伊凡是维拉第一任丈夫的儿子)。

二、爱与政治

斯塔克夫妇体现出的截然不同的爱情态度,自有其产生的深层原因。每个个体都不是单维度的,既有生物属性,又有社会属性。我们必须从这双重属性中去理解维拉。

在社会属性层面,维拉是一位资深的律师,供职于法律基金会,同情黑人,支持黑人解放运动,工作的核心是通过法律手段为广大黑人争取土地和生存权利。黑人解放运动取得胜利,新政府即将成立之时,维拉又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成为国家宪法问题技术委员会的委员。对维拉而言,工作即生活,生活即工作,二者并无本质区别。维拉的整个生活都围绕着政治,政治成了维拉的生活重心,“除了报纸,以及白皮书、蓝皮书之外,维拉从不阅读别的东西,家里放满了各种报告”²⁶⁷。她的朋友也是政治上的朋友,参加维拉的家庭聚会的朋友也都是政治上有关联的朋友。个人生活以及家庭都让位于政治,政治浪潮完全淹没了维拉,成了她社会属性层面的主宰。然而,在政治漩涡中,暴力、死亡、权力斗争随处可见,她在内心里深刻地领会到,她所做的工作很多都是“徒劳之举”¹⁰¹。维拉无法寻觅到存在的乐趣和意义。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工作中,维拉跳跃的意识流里,常常夹杂着大量对存在与自我的思考。

另外,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家庭传统随之消亡。家庭不再是温馨的港湾、秘密与负担的释放地,为了政治目的,而彼此沉默,保持秘密,并逐渐成为一种家庭生活方式。维拉生活在现在,被完全卷入政治生活中,而贝内特生活在过去,政治与他无关,他们缺乏沟通的基础。语言对他们而言,不是为了沟通,而是掩饰孤独。“忙了一天之后他们显然很孤独,想用继续吃东西和喝饮料,继续与同样的伙伴进行同样的谈话,来填补这种真空”⁹¹。

在生物属性层面,维拉性情放荡,这不仅表现在他与不同男人的关系之中,同时也表现在她的无意识之中。在她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时不时地涌现出大量的意识流片段,而这些无意识的思维片段,夹杂着大量维拉对性的回忆、期待与幻

想;而在她意识中对过去的记忆,亦是性爱为出发点。这些无意识的思维涌动,对维拉的放荡本性表露无遗。

人的社会属性和生物属性,好比人的两条腿,唯有用两条腿,才能正常行走和前进,缺一不可。维拉在社会属性层面无法寻觅到存在的乐趣与意义,必定转向生物属性层面寻找。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维拉一直以做爱的方式证明她的存在、寻找存在的意义。生理满足于维拉而言,“它不仅仅是愉快——它意味着你不再是独自一人。你们交换自我的负担。你成为另一个生物”¹³⁸。对于二人结合这一概念,普遍认为是可以与对方分享的,并且属于对方。你属于我,我属于你。维拉觉得这一概念“很惬意”,同时还认为“它是自我诸多问题的开端和结束”^{[4]581}。于是,生理满足便成了维拉寻求存在意义的源泉,通达“真理”的唯一途径²⁷⁹。她对自己的行为从未感到罪过,在她看来,她正在发现一种自由。而事实上,“爱常常是一种困难而痛苦的经历”,“是一种混乱而非平静的体验”^{[3]574}。而维拉在社会属性上存在意义的缺失,注定了她无法在存在意义的探寻上前进。小说的结尾尤其具有象征意义,“维拉在那里走动了片刻,然后继续上路,呼吸似卷轴般展开,她在面前留下一个签名”²⁸⁹。维拉在空中留下的“签名”,似乎象征了维拉在存在意义上寻求的徒劳:维拉的存在,好似水中月,镜中花般虚无缥缈,无从把握。这也预示了维拉必定陷入更深的孤独寂寞的宿命,而她的结局只能是“朝着自我独自行走”²⁷³。

贝内特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他可以看作是传统家庭观念的代表,代表了传统的、在当时社会已消失的、宁静而温馨的家庭存在方式。维拉则代表着南非社会已经发生变化的家庭及个人观念。正是由于他对家庭和爱情的专一执著,才导致了他一身的孤独和悲哀。老年时他一无所有,产业失败、被维拉抛弃、两个子女都没有正常的婚姻和家庭。爱和家庭反而加重了他的孤独和悲哀。当他最终认识这一点,他开始“怨恨——不是维拉,而是他对爱她的依赖”,他也不知道在离开维拉之后,“如何独自一人继续他的生活”²⁶⁷⁻²⁶⁸。读者朋友们不难想象,当贝内特领会到这一意义时,他感觉到的,不仅仅是孤独,大概还有后悔与绝望吧。

三、政治喧嚣与个体孤独

在南非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中,个体往往通过爱试图逃离那梦魇般的孤独处境。然而脆弱单薄的爱却无法帮助他们逃离孤独,反而将爱与被爱的人推向更加深远的孤独之境。维拉与贝内特所各自追求的爱,极度深刻地象征了此时此刻南非人可悲的生存状态。爱不是孤独的始作俑者,它不过是催化剂,将政治基础之上的孤独扩大而已。

对于现代人普遍感受到的孤独情绪,很多作家都在作品中进行过探讨。不少研究者也对这一孤独主题进行过定义和研究。在论文《〈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的爱与现代主义孤独》中,孤独被定义为“当人们缺少陪伴或与他人的交流时产生的一种悲伤隔离的感觉”^{[5]69},并且将现代主义孤独的原因归结为“完全丧失了个体之间真正交流,甚至丧失主体意识的生存状态,其根源是现代人迷失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缺少内部信仰和信念的结果”^{[5]69}。该论文从普遍意义上对现代主义孤独的成因,进行了定义。从这一角度看无疑是正确的。表面上,维拉和贝内特感受到的孤独,正是由于交流和家庭传统观念的缺失造成的。而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维拉和贝内特所感受到的南非式孤独,远比这普遍意义上的孤独感要复杂深刻。南非此时此刻的孤独成因,除了普遍意义上的成因,笔者认为还可做如下概括:

政治一度成了南非社会及个人生活的中心(甚至是全部)和指挥棒,人作为群体动物及感情动物的特性遭到忽视,被排挤到生活的边缘。政治生活将人与人的关系异化为简单的利益权力关系,人际联系紧紧围绕利益权力展开,使得沟通与交流变得遥不可及,个体变成了一座座孤岛,陷入无底的孤立隔绝深渊之中。政治生活的喧嚣之下,正是个体灵魂深处那无法排遣的孤独寂寞。

政治以及随之而来的孤独,就像梦魇一般笼罩着芸芸众生,给人以透不过气来的压抑。这一压抑氛围,在叙述贝内特的父亲过世的情景时,得到了极好的体现。维拉将此作了轻描淡写的叙述,认为老人的死,“像一块皮肤一样脱落了”¹⁴⁶。生命的消逝,被看得如此轻微。相对于贯穿小说那沉重的孤独而言,原本沉重的死亡却在孤独的衬托之下,显得如此之轻,像一块脱落的皮肤,微不足道。维拉作为儿媳,对老人的死亡没有丝毫

的悲伤,可见此时的家庭亲情淡薄到何种程度。这无处不在的孤独,就像死亡一样,谁都无法逃脱,而这正是维拉终其一生找到的真理:“自我是陪伴她的一种最终形式”^[286]。

维拉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又超越了它们,将它们搁置在一旁,再将它们抛弃,或则改变自己对待它们的态度,但是“一直存在于她生活之中的却是这一原因——政治原因——以及随之而来的全新生活方式”^{[4]583}。正是这一原因,铸就了斯塔克夫妇的可悲结局。

这种特殊的政治生活,给身处其中的家庭和个人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创伤。“在政治行动是唯一命令的时候,性情绪会反叛它”^[270],它使原本和谐温馨的家庭破裂,个人无法体会到存在的意义和乐趣,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和交流。整个社会都陷入斗争和孤立状态。

戈迪默认为“我们所处的社会塑造和影响着我们”^{[6]139}。在《无人伴随我》中,戈迪默借维拉之口,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这一观点:“政治影响未来一代又一代的人,并通过他们无止境地演化——人们将会有生活方式,他们进一步思维的方式”^[272]。政治就像魔咒一样,主导了南非社会及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人的性情以及个体存在的乐趣和意义。虽然爱使得斯托克夫妇的孤独感变得更加强烈,但我们也看到了爱带来的一线曙光。爱使得阿尼克的同性别杂色家庭成为了整个小说中最温馨,“最完整”的家庭^[7]。为了这个黑人婴儿,她们在上班的时候“一直不停地互相发疯似的打电话”^[275]。这样的爱恋,我们在小说中的其他家庭成员间是无法寻觅踪影的。阿尼克因为母亲维拉的情爱而变成了同性恋,然而爱又让她建立了最为温馨的

家庭,这是很有启示意义的。虽然这样的同性恋杂色家庭不能作为社会存在的常态出现,但是这却表明了戈迪默对未来南非社会的态度,可以用《无人伴随我》的题记来概括“我们决不能惧怕走的太远”,“在这条小路上无人伴随我”(题记)。将这样的诗句作为题记和小说题目,体现了戈迪默对爱与孤独这一叙事的大胆探索,对“生命的奥秘”的不断求索^{[8]138}。

[参考文献]

- [1] Allen, Sture. Nobel Lectures, Literature 1991-1995 [C].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1997.
- [2] Head, Dominic. Gordimer's None to Accompany me: Revisionism and Interregnum [J].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Vol. 26, No. 4 (Winter, 1995).
- [3] 纳丁·戈迪默. 无人伴随我[Z]. 金明,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 [4] Bazin, Nancy Topping & Gordimer, Nadine. An Interview with Nadine Gordimer [Z].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Vol. 36. No.4 (Winter, 1995), 571-587.
- [5] 徐明,汪洋.《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的爱与现代主义孤独[J]. 外国文学研究,2008(6):66-70.
- [6] Ernst, Ulrike. From Anti-apartheid to African Renaissance: Interviews with South Africa Writers and Critics on Cultural Politics Beyond the Cultural Struggle [Z]. Hamburg: LIT, 2002.
- [7] Kaye/Kantrowitz, Melanie. None to Accompany Me [J]. Tikkun. 10.3 (May-June 1995).
- [8] Clingman, Stephen. The Future is Another Country [J]. Transition, No. 56 (1992).

(责任编辑:朱德东,段文娟)

Loneliness in Nadine Gordimer's Writing

——Theme of Loneliness in None to Accompany Me

LIANG Ben-bin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hongqing Education College,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Starks' love experience as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e wide-existing loneliness and its reasons in None to Accompany Me. Politics dominates all aspects of the social and individual lives in South Africa.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s alienated into a simple interest-based relationship, denying the possibl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changes. Individuals are caught up in the abyss of loneliness. Love fails to rescue them out; rather, it condenses this terrible feeling. Under the sound of political life is the loneliness of the individuals in their deep soul.

Key words: None to Accompany Me; love; loneliness; politics